

從回歸古典學問精神到建立大國學術風範： 楊義先生“以會通致廣大”的治學思想

蔣金坤¹

摘要：古典學問精神所推崇的“博通”和“會通”思想，在近世以來遭遇書籍日繁、無力通觀的狀況，士人讀書治學面臨究竟是“專精”還是“博通”的困惑。二十世紀以來，東西方文明遭遇產生的“現代困惑”，促使楊義先生回歸古典學問精神，以“會通”的理念貫穿整個學術歷程，超越近代以來由於學科界隔而產生的專精與博通之爭，推動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並以形成“廣大”的研究格局為旨歸、這又關聯到楊義先生念茲在茲的建立大國學術風範。其建立大國學術風範的初衷是立足中華文化本位，與當代世界平等深度對話，通過建構中國特色的學理體系和話語體系，實現學術研究的中國化。由此，楊義先生“以會通致廣大”的治學思想在回歸古典學問精神和建立大國學術風範雙重影響之下得以成型。

關鍵詞：楊義；會通；廣大；古典學問精神；大國學術風範

楊義先生是當代中國傑出的文學研究家，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復興在學術領域的傑出代表。其學術活動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起步，在魯迅研

本文草成於在澳門大學跟隨楊義老師攻讀博士期間，為當時研讀楊義老師著作的學習體會；開始修改於2024年清明，時楊義老師遽歸道山已逾三秋。此番重新體味楊義老師的人格和學問，愈加明瞭其不懈追求學問的赤子之心，必將永存世間。師恩難忘，永遠懷念楊義老師。

¹ 蔣金坤，男，杭州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副編審、《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文體學、中古文學。

究、小說史研究、文學流派研究、文學圖誌研究等諸多領域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此後其學術視野上溯至古代小說史、中國敘事學、詩學、文學地理學、文學民族學、諸子學等領域，有力拓展出各領域研究的新格局。其治學理路可以概括為立足中華文化本位，融通古今中外學術，發掘中國原創智慧，建立大國學術風範。¹其中展現的思想脈絡，即是“以會通致廣大”。“會通”是就其研究理念而言，“廣大”是就其研究格局而論。楊義先生形成“以會通致廣大”的治學氣象，是其個人學術歷程中不斷摸索、凝練之後的產物，也是近代以來學術思想震蕩、轉換之後的回歸。故對於楊義先生的治學思想需要從學術生命和時代思潮兩個維度進行觀照。本文展現在面臨古典學問傳統與近代西學衝擊共同作用產生的學術機制時，楊義先生逐步演化生成的“以會通致廣大”治學思想。

一、“博通”到“會通”的古典學問精神

“君子不器”一向被奉為孔子治學育人的經典理念。正如朱熹所解讀：“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²其所言“不器”即是“相通”，核心就是強調君子所學相通，非祇受限於個別才藝。故《禮記·學記》展示出一條為古代士人設計的求學進階途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誦，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

¹ 以上內容轉引、概括自 2023 年 6 月 19 日楊義先生追悼會時印發的《楊義同志生平》。

² （宋）朱熹：《四書集注》，第 57 頁，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¹大學之道的最終目的是要化民易俗，從修身治學到化民易俗，其間一個關鍵就是博習論學之後“知類通達”的大成階段。《說文解字》中“通”“達”同訓，說明成材的基礎是博學，博學的進階在能“通”。所謂“大成”，就是要做到學問的博通。

古代士人讀書治學都講究“博通”二字。“博通”一詞在《後漢書》中大量用於形容東漢士人的學識，諸如“博通群書”“博通經典”“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等。博通的前提是博，就是對文獻知識廣泛的掌握；目的是通，即是對所掌握文獻知識的融通。二者相輔相成，構成古代士人讀書治學的代表性觀念之一。《孟子·離婁下》中就點明：“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²朱熹解釋道：“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鬥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³孟子的觀念和朱熹的注解清晰地解答了讀書“由博返約”的道理，即廣博地學習且能詳細地掌握所學知識，融會貫通之後深刻理解所學知識。廣博學習到融會貫通是學者取得成就的重要路徑，故章學誠稱“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⁴。

錢穆根據自身治學的經驗，深刻地總結出古代士人讀書治學由“專”到“博”，再由“博”返“約”的門徑：

講學問入門，須由專而博。開始專讀一書、一人、一家、一派，祇求從一門入去求瞭解，漸漸推廣至別一書、別一人、別一家派，亦如此專門下工夫。卻不可道聽塗說，自欺欺人，對某一門學問並未入門，強把別人

¹《論語正義》：鄭玄注、孔穎達疏，第1052—10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²《孟子注疏》：趙岐注、孫奭疏，第22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³（宋）朱熹：《四書集注》，第29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⁴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第161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話來改頭換面隨意立說；亦不當在自己未入門的學問中妄下批評，或妄出意見。既能博了，又須進一步由博返約。此所謂約，乃指其歸屬於他自己的，亦如中庸之所謂致曲。當知一個大學者廣通博達，到頭所成則祇是一曲而已。惟致曲之後，則又須能化。¹

就如上文指出，由專而博，是知識層面的積累，即有一個不斷地閱讀一書、一人、一家和一派的過程。由博返約，是思想層面的理解，達成《中庸》裏面所謂的“其次致曲，曲則有誠”，“唯天下至誠為能化”²。朱熹曾回答關於“其次致曲，曲則有誠”的提問時指出：“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祇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通貫乎全體矣。”³概而言之，就是學習知識積累廣博到最後豁然貫通，這樣也就做到了“約”，也就是學者成就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至於之後的“能化”，則代表着思想層面凝煉的一家之言，擴展到其他領域加以運用，從而達到各個領域知識和理念的“會通”。

因此，“博通”之“通”的深層含義在於實現“會通”。“會通”思想出自《周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⁴高亨釋解認為：“此言聖人有以見到天下事物之運動變化，而觀察其會合貫通之處，從而推行社會之典章制度。”⁵這意味着“會通”思想的根源在於理解天道變化的至理後，貫通推廣到社會制度層面。“會通”是“博通”之後的進一步提升，由知識貫通層面上升到理念互通階段，避免祇是掌握單

¹ 錢穆：《學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冊，第182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² （宋）朱熹：《四書集注》，第2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³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1574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⁴ 《周易正義》：王弼注、孔穎達疏，第27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⁵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518頁，齊魯書社1979年版。

一知識結構造成“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的局面。“會通”意味着不同領域、時代和地域的知識及相關學術理念的互通。南宋鄭樵就極力強調“會通”的重要意義：“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¹這是從橫向的空間和縱向的時間立論，闡發孔子會通古今天下而取得成就的意義。不同的知識領域同樣也需要講求會通。

“通”的境界在儒家思想觀念中既是培養君子的象徵，也是研習學問的門徑。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治學著述精神至今尤振聳發聵。古典學問精神中的“通”包含着由“博通”至“會通”的兩個層面。“博通”代表着大量知識吸收到極致後的豁然貫通，之後再進一步將貫通後的理念推廣，從而“會通”起時間長流中、宇宙空間下的不同知識領域及理念。由“博通”向“會通”的進階，意味着由“一家之言”的單純個例總結為“通觀衢路”的普遍原則，也是古典學問精神所尋求的最高境界。

二、“專精”或“博通”的近代治學困惑

古典學問所追求的“會通”境界，已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哲學意味，可謂知易行難。古代士人，特別是近世以來的士人，並非一味強調學問的“會通”境界，而是囿於社會實際原因，落入治學究竟是“專精”還是“博通”的困惑。宋代以來造紙術、印刷術發展以及市民文化興起，書籍越來越多，傳播越來越快，獲取越來越易。士人可接觸、閱讀和收藏的書籍呈現爆炸式

¹（宋）鄭樵：《通志二十略》，第1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增長。書籍日增，無力通觀，成為擺在宋代以後士人面前的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士人治學反而多強調“專精”，如朱熹的宗旨就是“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¹。

“博通”或“專精”的困惑影響近代以來士人對讀書治學的思考。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²張之洞充分認識到時移事異，先秦時代所謂“先博後約”已不合如今書籍汗牛充棟的實際，所以推崇“守約施博”的讀書治學態度。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中，編列五類書目，其最後一類“隨意涉覽書類”前言指出：“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尚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為何。隨意涉獵，初時並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³梁啟超特在經、史、子、集書目之後，列出此類別，強調學問以專精為主、博涉為輔的思路。近世以來學者讀書治學面臨着“博通”和“專精”無法兼得的困境。因此他們多有主張讀書治學貴專精的心態，並提出“守約施博”的方案。

近代以來，學者治學不僅原有的書籍日繁狀況持續加劇，而且還面臨高校學科分類愈加細化的新境遇。就分科設置來說，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將學科分為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七科。七科

¹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168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² 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編：《張之洞全集》，第972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³ 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二，第16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下面又細分若干子類，如文學科下面又包含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和外國語言文字學七個小類。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學時，主張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將文理科細分為十四個系，也表示着現代意義上大學學科分類開始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佔據主導地位。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儘管大學走向學科分類，其教育理念卻主張培養通才。《京師大學堂章程》全學綱領第一節就點明“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全學之綱領”¹。蔡元培文理二科的培養方式，就是一種通才教育，他認為“學人難，惟通人更難。學人惟守先待後，通人則開風氣者”²。其顯然對於通人評價更高，寄予開一代風氣的厚望。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強調“通”的重要意義：“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³總之，他們主張的都是培養既懂得在專業領域“做事”，又懂得“做人”的領袖型“學科通才”，從而達到開發民智、使民更新的目的，這幾乎是近代眾多大學校長和著名教育家的共同主張。⁴當然，這並不是理想中的“全科通才”，也不等同於古典意義上的“通才”。

二十世紀初的學科分類是中國學術現代轉型過程的標誌事件，代表着中國現代學術開始走向與國際接軌。到二十世紀後半葉，制度化的學科分類遭到質疑，學者開始挑戰既定學科的邊界。學科分類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同樣受制於學科分類，它呈現出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專業化色彩增強的同時，又存在多學科交叉融通的傾向。這正

¹ 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4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² 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7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³ 梅貽琦：《梅貽琦自述》，第169頁，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⁴ 王義遒：《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中的“博通”與“專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8頁。

是中國古典學問傳統遭遇西方現代學術規範所激發的火花。錢穆曾指出中西學術的差異：

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有相入。¹

中西學術一重和合，一重分別，秉性有別。由此學習西方學科分類所培養的專家，遭遇到中國學術文、史、哲並非界限分明的狀況，必然會顯得扞格難入。這是中國通人之學和西方專家之學的區別。但無可諱言的是，隨着二十世紀後半葉學科門戶之限愈深，治學之士多為專家，通才在當今尤顯可貴。因此，如何發掘古典學問中“會通”的精神，並將其與中國現代學術發展進程連接起來，真正實現中國學術研究的現代轉型，是現代學者亟需思考的問題。

三、楊義先生“會通”的理念與中國學術現代轉型

楊義先生對基於“會通”的理念所建構的學術範式和學術方法，以及如何實現古典學問精神中“會通”理念的現代轉型，有着長期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在解讀“融會貫通”這個詞時，指出“作為一個術語，它又分別表達為‘融通’、‘貫通’或‘會通’，其他字可以省略，唯‘通’字不能省。通，是中國學術的化生包容的氣度”²。這是從“通”對於中國學術追求內在化和體系化的思想方式上把握其價值，表明它在中國學術思想中不可缺省的

¹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² 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第216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地位。楊義先生從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術思潮出發，總結前輩學者面臨博通還是專精的困惑所作的選擇，闡發出“新會通”的學術理念。

“新會通”理念是基於新形勢下遭遇的“現代的苦惱”，在現代意義中重新闡釋古典學問精神中的“會通”理念。故楊義先生總結近現代學者的學術思想和成就，以明“通”和“專”的關係。他將學者分為兩派，一是文化運動派，多追求博識，主張由博返約；一是學院派，多困守專業，主張通專成博。從“新會通”思想的眼光看，前者的意義在於將專門知識和時代智慧結合，追求學術最有效的切入點。後者的意義在於聚合眾多“窄而深”的專門知識，以加強會通的根據。¹因此根據時、地和人的差異，“新會通”理念“既可以在時代智慧中獲得一個‘新’字，在傳統學術中獲得一個‘實’字，又可以在深度識力中獲得一個‘深’字。這新、實、深三字相互衝突和不同配比，使會通在流動中實現自己的兼融性和創造性，從而成為一個具有廣闊的世界視境和與時俱進的方法論概念”²。楊義先生在總結兩派學術特點時，指出“會通”理念在現代發展的方向：“新”“實”“深”，呈現出在回歸古典學問精神基礎上的中國現代學術轉型。楊義先生具體從“古今、中外貫通”和“材料、方法打通”兩個視角來闡發其“新會通”理念。

其一，“古今、中外貫通”。楊義先生從方法論角度詳細闡發“古今貫通”的前提、原則、維度和管道，等於是找到一條“會通”的學術理念在現代實踐的路徑。首先，“古今貫通”的前提是大文學觀視野。這是古

¹ 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第 241 頁，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² 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第 252 頁，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典文史不分、文筆並舉的雜文學觀，遭遇近代以來西方知識體系下的純文學觀之後，在現代學術轉型中形成融合東西方的新視野，它“既兼容了純文學觀的嚴格的學科體系，又吸收了雜文觀的那種博學精思和融會貫通的思路，用這種內精純而外淵博的觀念看古今貫通和中西融合的問題”¹。大文學觀視野的貫徹，是古今貫通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其次，楊義先生結合魯迅的研究成就提出“能大始貫”“有識方貫”和“知性求貫”的三原則，並強調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把握住“古今貫通”方法論的總體方向，並以此提出實現“貫通”的四種管道，即對原型思維的理解，對地理情結的透視，對精神譜系的梳理和對歷史疑似的昇華。這四種管道兼顧時間和空間維度、特定文化因數的衍變軌跡、恆久性的民族潛意識和隨機性的時代心理結構²，也真正指明了如何以“貫通”方法處理現代語境下的新課題。

其二，“材料、方法打通”。楊義先生在實踐自身“會通”理念時，主要從材料、方法等層面實現打通。在研究《論語》時，楊義先生就提煉出“四個打通”原則，即“打通經傳，打通孔子與七十子及其後學，打通孔、孟、荀，打通孔府之學與孔門之學”³。其核心就是打通《論語》內外的所有孔子材料，以此體悟歷史情境下的哲學理思。楊義先生的“打通”還包括對研究方法運用的融通，單就《莊子還原》一書就採用了地域文化學、人文地理學、姓氏譜系學、自然生態學、深層心理學、自然生態學、歷史編年學、方

¹ 楊義：《讀書的啓示：楊義學術演講錄》，第4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² 楊義：《讀書的啓示：楊義學術演講錄》，第8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³ 楊義：《論語還原》，第313頁，中華書局2015年版。

誌研究等研究方法。恰如武者對陣，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無施不可。現代學術研究方法花樣繁多，最重要在於是否適用研究對象。楊義先生既懂得傳統方法，又能創造新方法，如其對中國敘事學和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總結，使他在分析研究對象時能夠“從心所欲”，既不盲從於根據西方歷史、現實所形成的理論，又能總結出符合中國學術特色的方法。在材料、方法打通之時，完成對學理的會通。

楊義先生會通理念產生與其學術歷程密切相關。其學術歷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青年時期，先由治現代小說始，開啟個人著史的潮流。壯年時期，轉移到中國古典小說領域，旁及中國敘事學及古典詩學，超越現代與古典的學科分割。盛年時期，兼治少數民族文學，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打破“漢胡分家”的分隔狀況。晚年時期，專注先秦諸子研究，打通文史哲的學科界限。借用其自選集學術自述中的話，就是“年輕關注現代新潮，中年關注古老傳統，盛年縱觀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整體性，晚年直指中國文化奠基性原創的本源”¹。這一學術歷程從現代小說一直上溯至先秦諸子，貫通了古今、民族、地域和學科之間的各個層面，回歸到中國學問最根本和最經典的源頭。而且楊義先生每一次學術興趣轉移都在進一步推進其有關“會通”的學術理念建立。他每次都是在新領域紮下硬功夫，啃讀新材料，在牢固文獻基礎上爆發出強大的學術創造力，開拓出全新的學術增長點。其後在各個領域之間，材料和材料互證，方法和方法互通，學理和學理互融，建構起其宏大的學術抱負、開闊的學術視野、會通的學術理念。

¹ 楊義：《尋找大國學術風範：楊義自選集》，第3頁，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會通”的理念貫穿了楊義先生整個的學術歷程。楊義先生在探索、建構自身學術版圖的過程中，超越近代以來由於學科界隔而產生的專精與博通之爭，回歸到“會通”的古典學問精神，並生發出新的時代內涵，由此推動現代學術轉型。楊義先生以“會通”理念推動現代學術轉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會通理念推進跨學科研究。楊義先生從總結前人的學術思想，到提出自己的學術方法，全方面完成在現代學術轉型語境下對“會通”這個學術理念的闡釋和理解。這裡的“會通”，從時間上不論古今，從地域上不限中外，從材料上不分文史，從方法上不拘學科，都是統攝在學理闡發之中。由此突破了近代分科體系之下的單一學科限制，利用多種學科方法體系，真正實現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開拓了多個研究領域的新視野。二是以會通理念推進新理論建構。楊義先生愛用“通”字命名所出專著，如《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感悟通論》《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文學地理學會通》等，都特別強調學術研究中“會通”的思想。諸書所謂的“通”，並非泛泛而談的通論，而是在高立意、大視野下通觀研究對象，以此在學理意義上將研究對象的脈絡貫通起來，完成實質上的理論建構，也就是將研究對象學理化、精煉化和體系化，實現學理層面的會通。如研究敘事學時，就總結出“還原—參照—貫通—融創”八字理念，即立足經典，返回中國文化的原點，參照西方已有的現代理論和成果，實行貫通古今文史的綜合性研究，最終融合創新推動中國敘事學研究的現代轉型。

四、楊義先生“廣大”的格局與建立大國學術風範

楊義先生以“會通”理念推進現代學術轉型，其旨歸是形成“廣大”的研究格局。對於“廣大”格局的追求，並非楊義先生獨創。近代以來一直存在着一種聲音，即調和看似對立的“專精”和“博通”思想，使二者深度結合，以達到治學的理想狀態。胡適在《讀書》一文中提到：

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惟他獨尊，無人能及。他用他的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次及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塔。¹

胡適心目中的理想學者是專精的學問幾乎做到無人能及地步，博覽的學問甚至旁及毫無相關領域，即專精者愈加精深，博覽者愈加廣博，並將之比喻為“金字塔”。無獨有偶，這個“金字塔”比喻也為陳垣所肯定。他說：“祇博不專，難於成功；祇約不博，難於貫通。要先博後專，或先博後約，使學識成為金字塔形。”² 陳垣闡述的這個比喻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金字塔之喻講專精和博通並重的關係，陳垣返回到先秦時“先博後約”的講法，強調治學要在打好廣闊而深厚的根基之後再講求專門的研究，有異於近世以來的“守約施博”思路。二是點明了“貫通”的重要性，即專精和博覽之間需要貫通，這樣上下連通才是金字塔能夠矗立的關鍵。這也讓之後的

¹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第12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² 李瑚：《晚學集》，第3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學者，並不糾結於“專”和“博”的主次，而是追求“專精”和“博通”並重的學術理想。胡適另有“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¹之詩句來闡明這個有趣的比喻。其實質是強調治學要專精和博覽並重，會通各個領域，以達到“廣大且高”的研究境界。其中的“廣大”對應於“博覽”，主要是從學問層面而言。

近代學者提出“為學要如金字塔”這個比喻，尋求消解“專”和“博”之間的主次和界限，重新確立“專精”和“博通”並重的古典學問精神，以求達到“廣大且高”的學術境界。楊義先生對於“廣大”格局的闡釋，同樣是回應近代以來治學專精或博通的困境。其對於“以會通致廣大”有兩個層面的理解：一是學問層面的。“古今貫通應是一種學問家兼思想家的貫通，以學問家涵蓋廣大，以思想家穿透深湛。”²此即是強調以學問的博通廣大為根基，以尋求思想的穿透力。二是境界層面的。“哲學是西方學科分類和知識彙總的術語，感悟而聯繫哲學二字，是非常陌生的，可能有人會認為它‘不通’。但是不通中求通，乃為‘大通’，它有可能使文化學術達致一種新的境界，‘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語），在學術的形態和深廣度上都獲得原創性的拓展。”³此即是強調由通致廣大，從而獲得學術的原創性。楊義先生對於“廣大”的追求，超越了近代以來止步於學問層面的理解，而臻於境界層面，由此凸顯現代學術研究所應達到的格局。

¹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第13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² 楊義：《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從敘事學、詩學到諸子學》，第43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³ 楊義：《感悟通論》，第3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楊義先生對於“廣大”的研究格局的認同，與其念茲在茲的建立大國學術風範有着密切關聯。何謂“大國學術風範”，楊義先生其實並未賦予非常精準的定義。在2009年的一次訪談中，楊義先生在回答“如何理解現代大國學術文化風範”時，提出“所謂現代大國的學術文化風範，就是深厚博大，充溢着原創的精神和智慧的魅力”¹。因此，“大國學術風範”的特徵，一是深厚博大。“深厚博大，須下苦功夫、硬功夫，積學深功，融合中外，審視古今，悟道深湛。”二是原創智慧。“原創的智慧，則需要公心慧眼，識其妙處。”²這與楊義先生所論述的“廣大”格局一脈相承，即在深厚博大的學問層面基礎上，尋求境界層面的原創智慧，從而建立大國學術風範。

楊義先生建立大國學術風範的初衷是立足中華文化本位，與當代世界平等深度對話，這是“閱歷時變”的一代學者之憂思所在，亦是他們所不斷追尋的治學境界。楊義先生指出：“建立大國的學術風範，既是非常之視野，就須在總覽中外、貫通古今中，啟動五學綜合這種非常方法論，‘竿頭更進’亦可，‘竿頭轉身’亦何妨，拋棄拾人牙慧的猥瑣，磨銳辨析疑義的眼光，增強解釋經典的能力，構築一種可以和當代世界進行平等的深度對話的學理體系和話語體系。”³其要義即在於建立大國學術風範，在會通古今中外基礎上，以原創的精神、獨到的智慧，增強中華文化的闡釋力，與當代世界

¹ 朱慧：《開創大國學術風範·走中國特色思想學術文化之路——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楊義先生》，《今日中國論壇》2009年第2—3期，第147頁。

² 朱慧：《開創大國學術風範·走中國特色思想學術文化之路——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楊義先生》，《今日中國論壇》2009年第2—3期，第147頁。

³ 楊義：《中國文化的精神：楊義自選集》，第462頁，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版。

進行平等而有深度的對話。“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一個關鍵，在於從實質意義上振奮和提高對自身文化根子的原創性解釋能力，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解釋既符合歷史實際，又具有說服力、生命力、學理魅力，可以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的共識。我們可以在愈益豐富的層面和範圍上，與當代世界進行平等的深度對話，為全人類的思想智慧庫藏增添屬於中國原創的珍寶。”¹而建立大國學術風範的核心舉措就是建構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學理體系和話語體系。這一構想亦是貫穿了楊義先生的研究生涯，早在2001年的訪談中即提出“我們需要返回到一種大文學觀，以世界的視野重新建構，既融合純文學觀的精審，又融合雜文學觀的淵博，從這裡探討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²。

楊義先生致力於建構中國特色的學理體系和話語體系，其顯著標誌就是學術研究的中國化。劉躍進總結百年中國學術發展歷程，將刷新整合學科作為新世紀中國文學學術熱點之一，即“一方面是對於過去專業劃分過細的弊端有所反思，強調綜合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回歸傳統、回歸文學經典、強化個案研究的傾向。而最終的目標，是儘早步入文學研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³。這裡指出新世紀文學研究實現中國化的兩個方向，即打破學科專業界限的綜合研究，回歸中國文學的傳統和經典。從楊義先生的學術歷程和治學思想來說，他可以說是領先實踐文學研究中國化的學者標桿，亦是中國文化復興在學術領域的傑出代表。楊義先生始終關注並

¹ 郝慶軍：《大國學術風範的探尋與追求——楊義談話錄》，《文藝報》2016年3月18日。

²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演講集》，第4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³ 劉躍進：《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若干熱點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年8月28日。

實踐着學術研究的中國化，這與其在學術研究中運用外來經驗解決中國問題時常有扞格不通之感有關。“外來知識的本土化過程，相對於本土經驗的現代化過程，既存在着知識論上的緊密聯繫，又不能在本體論上絲絲入扣地加以代替。因此必須進行會通，進行平等而深入的文化對話，才能以現代性的形態，重現中國智慧的神理和滋味。”¹正是中國文化強大的內生效應，以及外來知識受限的闡釋空間，使楊義先生在現代轉型中會通中外，注重中國古典的智慧，強調與外來文明的平等對話。因此，楊義先生特別提出“現代大國的文化解釋力”命題，希望“以現代性意識和創新性方法，啟動數千年文化遺產內蘊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氣勃勃地感動現代人的心靈，使之成為我們與當代世界進行對話的渾厚精深的文化底氣”²。對於現代大國文化解釋力的追求，是期望中國學術現代化轉型之後，成為現代社會的精神食糧和全人類的共同智慧，讓學術研究由立足本土的中國化轉向走向文明互鑒的世界化融通。這也是現代學術研究進程中接受古典學問精神回歸並建立大國學術風範的意義所在。

¹ 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第218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² 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第3—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